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 (上)

蔡方鹿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 (上)

蔡方鹿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序

“峻极之山，非一石所成，凌云之榭，非一木所构”。巍巍高山，不是一石所垒；穿云房屋，不是一木所建。其中蕴含着多少汗水、心血和智慧，真乃不可胜计，一言难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蔡方鹿教授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徜徉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库中；他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殚精竭思，涵泳于中华民族深邃哲学的海洋里。30 多年来，其著作富五车，获得了骄人的成就，而成佼佼者。今又完成了 100 多万字的《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巨著，值得庆贺！

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博大精深，既有“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思想资源，又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食粮。非对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有高深的造诣，是不敢碰其难，又何敢谈其成。

经是相对于“传”和“子”而言的；经是由古代官方所确定的儒家经典的通称。经学一词，较早见于《汉书·兒宽传》。在现代意义上，经学是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典的研究与诠释的学问。

在先秦时期，尽管有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并提，但并没有哪一家尊奉其为经。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儒、道、墨、名、法、阴阳、纵横、兵，各家都列“六艺”以论述或表达其思想观点，并没有归属于哪一家，为那一家所独有。各家代表人物所著的书，或弟子所记载的言行而编纂的书，不仅以其代表人物称“某某子”，其书也以“子”称谓。如《管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就此而言，子与子之间是平等的，并无尊卑轻重之别。这时并没有形成

以“六艺”^①为对象的、以训诂、义理为诠释方法的经学。所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称这个时期为“子学时代”，是有道理的。皮锡瑞《经学历史》载：“孔子以前，不得有经。”

汉以后，特别是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秦始皇所焚的《诗》、《书》等“六艺”，据传曾经孔子整理，便将其归属于儒家，成为儒家的经典，排斥了其他各家的所有权，这是独尊儒术的效应。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乐》佚），后有九经，唐刻十二经（《开成石经》），宋代十三经（《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把本与《管子》、《老子》并为子书的《论语》、《孟子》，尊为儒家经典。

汉承秦制，汉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儒学作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亦被强化。“五经”或“十三经”作为主导意识形态所依傍的经典文本，不仅专归于儒家，而且亦得到强化。经成为中华社会、政治、文化、制度建构的基础，及其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从狭义上说，经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儒家“五经”、“十三经”为核心的研究与诠释的学问。但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先秦的各家在不同时期，亦得到不同程度的弘扬和兴盛，各家亦以自家学派创始人的著作、或其他重要著作，尊奉为本派的经典。这在先秦已经出现。《墨子》书中不仅有《经上》、《经下》两篇，而且其后学已尊《墨子》为《墨经》。据《庄子·天下篇》记载：“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②《管子》中有《经言》。从道家到道教，便尊奉《老子》为《道德经》，《庄子》为《南华经》等。既然儒家把共同作为诸子书的《论语》、《孟子》奉为经书，那么，其他各家当然可以把本派的《管子》、《墨子》、《老子》、《庄子》尊奉为本学派的经书。如此，经学从广义上说，应包括《管子》、

^① 刘歆编纂《七略》，其中在《六艺略》。“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礼，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艺文志》，《汉书》卷三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23页。）

^② 《天下》，《庄子集释》卷10下，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79页。按：巨子为墨派团体的首领。

《墨子》、《老子》、《庄子》等。中国传统经学可以有狭义、广义之分，其所涵蕴有别。这就是说各经其经，经人之经，以他平他，生生不息。

经学为道屡迁，唯变所适。经学面临不同时代的冲突与危机，经学家为化解时代的冲突和危机，便从经典文本中选择适合于化解时代冲突和危机的资源，依据经学家主体对时代冲突和危机的体认，开出体现时代精神和适合时代需要的诠释和生命。

经学的生命就在于创新；无创新，经学的生命就会枯萎。从精神价值层面说，经学是经学家试图穿越时空的隧道，与经典文本的作者及其文本进行对话，以体贴其意蕴。然而经学家的时代意识、文化氛围，及时空隧道的阴暗，其间不免有所隔阂，只能凭借经学家发挥主体智慧，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诠释，这种诠释是时代的再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经学，都是一定时代、特定经学家依据自身已有价值观对于一定经典文本的体认和诠释。换言之，一切经学，都是一定时代的经学。因为它是渗透了特定时代经学家价值观的经学。

基于这样的体认，经学的现代价值具有：

其一，经学是中华文化之根、之魂。中华文化之根深，才能枝壮叶茂；中华文化之魂灵，才能智能创新。它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文化的生命智慧。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① 中华哲学理论思维的每一次新的突破和创新，都是一次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回归，为其提供了精神的动力。

秦汉是中国社会体制、国家形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体现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重新洗牌、选择时期。汉武帝为了化解当时面临的严峻的地方诸侯王与中央王朝、匈奴民族的经常侵犯，以及政治思想上的“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等三大冲突，所带来社会的不安定，以实现其大一统和长治久安的需要，他以开放的姿

^①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态,邀请诸方人士及贤良文学之士,以对策方式提出化解冲突的建议或方案。通过“五经”中《诗》、《书》、《春秋》等经学家建议与方案的比照,既罢黜了法家的思想,也否定了《诗》、《书》等博士的论述,最终采纳了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主张,董氏以《公羊春秋》经作为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之所以选择《公羊春秋》经,是因为今文经重微言大义,有从经典文本话语中寻觅解释空间的可能。《公羊春秋》其大一统的国家观,通三统的改制论,张三世的历史观和夷夏变移论,既有效地化解了汉武帝时代所面临的社会三大冲突,又为其改制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并为其巩固大一统的集权制度作了合法性的论证。《公羊春秋》经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创新性的研究和诠释,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公羊春秋》作为董仲舒所依傍的经典诠释文本,重新焕发了新生命,为汉代长治久安提供了精神动力。这是董仲舒对经学的一次智能创造。

魏晋玄学经学思潮,横扫汉以来以名物训诂为重的古文经学,以得意忘言的抽象思辨诠释经典,其所依傍的经典诠释文本为“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三玄”是其时代精神的选择。宋明理学经学思潮,为重建伦理道德与价值理想,从强调“天理”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六经注我”的思辨方法,诠释经典文本中具有普遍价值的理气、心性话题。其所依傍的经典诠释文本是“四书”,除《论语》、《孟子》已成书外,又选《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加以章句诠释,单独成书,便合成“四书”。体现了时代精神和社会需要。

如果说,以往所谓适应社会需要和体现时代精神,是指适应中国某一时期社会需要和体现中国某一时期时代精神为对象而思的话,那么,在当今已度越了地域的局限,以全球的意识、人类的观念,依据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而造成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的危机。此五大冲突和危机,是与每个国家、民族以及每个人的命运切切相关相连的,而不可逃。为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已不能像现代新儒家那样接着宋明理学中的理体学、心体学、气体学讲了,而需要开辟新路径、新理论、新思维、新方法。和合学以其新,试图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它所依傍的主

要经典诠释文本，是据传“春秋外传”的《国语》，这是一次使经学重新焕发生命智慧和智能创造的机遇，是一次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回归和复兴的时机。每一次经典文本的重新选择和诠释，都标志着经学和哲学理论思维的觉醒和新体系的诞生。

其二，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民族精神是对民族生命存在和民族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民族价值理想、终极关怀的执著追求，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文化思想、精神灵魂。它是民族的脊梁，无脊梁的民族，只能卑躬屈膝，不能自作主宰；它是民族的主心骨，无主心骨的民族，只能唯命是从，不能自由选择。然而，近现代以降，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不断侵略下，他们肆无忌惮地火烧圆明园，大肆抢掠文物。他们不仅以武力侵占中华大地的领土，而且倾销毒品鸦片，危害中国人民的身心。中华民族在屈辱悲愤的情境下，被迫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大大伤害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尊严。

当今，应振奋、发扬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塑造，需要继先圣先贤的教导；续经典文本的精蕴；发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和位育、仁民爱物、先忧后乐、艰苦奋斗、公平正直、经世致用、团结御侮、革故鼎新的民族精神；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以和为贵、以德报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民族精神。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质、品格、心理、胸怀、神韵，它深深地扎根于百姓日用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为人处世、风俗习惯之中，从而升华为中华民族经久不息、大化流行的民族精神。经典文本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经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故乡。民族精神故乡的繁荣之日，也是中华民族腾飞之时。

其三，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培育。道德精神的价值之源是天命、天理。《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的本性的善恶，人的禀赋的天理，或为五常之德；人循着本然之性，各有当行的路，这就叫做道；人的性与道虽同，但各人气禀有差分，通过修身养性，以实行道，这就叫做教化。性、道、教的道德价值，具有一种先天性。

从道德精神价值视阈以观，如果说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为人道主义爱人的王道道德精神的话，那么，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体现为霸权主义损人的霸道道德精神。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曾认为，孔子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健全的、纯朴的、正直的、诚实的道德，是渗透到血和肉中的人的道德，而不是幻想的、伪善的、道貌岸然的道德”^①。它培养了中华民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为他、利他、立他、达他的他的道德精神和仁者的道德精神。

这种他者、仁者的道德精神，即是恕道精神，它的核心内涵是“爱人”。无爱人之心，便不可能实践他者、仁者、恕者的道德精神。这就是说只有尊重、爱护他者，也就是尊重、爱护你自己，才能实现仁者、恕者的道德精神。

实现以“爱人”为核心内涵的他者、仁者、恕者道德精神的方法。孔子认为最佳的选择是“能近取譬”。简言之，即从我做起，或从同我最亲近的人做起，推己及人，推及他者。“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对与自己最亲近的父母要孝顺，对兄长要悌。以孝悌自己父母、兄弟、妻子的爱心，推及出去，去爱他人，以至仁民爱物，爱天下万物。

如何操作以爱人为核心内涵的仁者道德精神？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②。恭敬、宽厚、诚信、智慧、勤敏，这是仁者道德精神的体现。

如果说爱人是内在自我主体的柔性隐在主体，那么，恭、宽、信、敏、惠和温、良、恭、俭、让是外在自我主体阳性显在主体。前者即孟子所说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人具有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亦即仁义礼智之心的道德精神，后者即仁、义、礼、智所体现的道德价值的行为活动。这就是人所具有的全德善性。

“天地之生，人为贵”。人的贵就贵在有道德精神，这是人与水火、草木、禽兽之所有别的标志所在。人因其有道德精神，便可推己及人及物。推己及人及物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自己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要以修身为本。修身才能实现内圣外王之功之业。《尚书·大禹谟》曰：“满招损，谦受益。”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78页。

② 《阳货》，《论语集注》卷九。

自满就会招来损害，谦虚就会得到利益。也就是说，“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机遇与危机并存，保持“谦受益”的道德精神，既有利于弘扬中华软实力，亦有益于建构和谐世界。

其四，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安顿。《周易·说卦传》说：“昔者，圣人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地人虽为三才之道，但陆九渊说：“天地人之才等耳。”这里的人是一大写的人。然而人身需要安，人命诉求立，这是人生的本原性、根本性的话题，人人都不可逃。在人生的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以后，精神的安顿就成为第一需要。人身安在哪里？人命立在哪里？这是无人不追求的话题。

在经典文本中，安身立命的安身，见于《周易·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天地人世的变化，有屈伸往来，尺蠖、龙蛇依其自然本能而生存。人是有智慧、有道德的存在，人能内思精义，而外以经世致用；外以利用以安身心，而能内以崇尚德性。内外互动，以安身崇德。立命见于《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所以立命也。”孟子开出立命的两条路向：一知天命的路线，从穷尽良知善心，觉解其本而达到知天命；二是事天命的路线，从操存本涵养本性的工夫，以事奉天命。尽管人的寿有长有短，但不改变通过修身养性的践履工夫，确立生命的价值，即在涵养生命性体的全德、立命。这两条指向天命的路线，都是内外互动静相资的过程。

尽管在先秦经典文本中，安身立命分言，安身立命作为人生价值和灵魂精神的安顿，相关相融的。安身为了立命，立命为使身有安。身与命安立在哪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安立在权利的你争我夺中，有安置在酒色气中，有安顿在名利场中，有安立在仁民爱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体认天地万物之理以及社会人生的道理，穷尽和扩充其自性，即事物的本性、本质，而能掌握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才能使安身立命避免误入迷途。

如何给人以安身立命之所？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在哪里？就是在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之中。这是中华民族之根、中华民族之魂的所在

和载体，这个根与魂的基点，就是和合生生道体^①。这是中华民族生命延续和智慧开拓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终极关切，这是灵魂安顿的精神安心，这是就形而上层面说的；就形而下百姓日用层面说，那就是衣食住行的获得保障，那就是现实关怀的身体安身。在这两层面的安心安身中，立命也得以在其间扩展、渗透、立命即在所安的身心中，身心所安即在立命中，两者圆融无碍。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根之魂的基点的和合生生道体，是安身立命之所在，是终极关切之所在。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亲和力的所在。它作为人类特殊价值需要提供了可能。人是需要有信仰和敬畏的。中国人既有“慎终追远”的祖宗崇拜，亦有敬畏天和鬼神的自然崇拜，以及各种价值理念的信仰。信仰给生命以动力和方向，信仰给宇宙、社会、人生以和谐和安定。“天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是和合生生道体的境界。

其五，现代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价值资源。中华民族爱智者所撰的经典文本，都是从面向宇宙、面向社会、面向人生中汲取生命智慧的乳汁和智能创造的动力，从而开出对宇宙的关怀、社会的关切、人生的关爱。在经典文本中关于和、和谐、和合的智慧卓识，资源丰富。殷周时，和、和谐、和合作为声音的相应和，而推致作为如何处理自然、人际、家庭、社会、邦国间的指导原则，及社会政治、国家治理、万物生育的首要价值。《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尧任用德才兼备的人，使九族的人亲和、和睦相处，进而使各邦国之间和谐，天下百姓变恶为善，和雍共处。《诗经》讲和蕴涵和乐、和鸾、和旨、和奏、和鸣、和羹的意义。《春秋左传》中记载晏婴与齐景公在探讨“和同之辩”时，引《诗经》和羹之喻，说明和羹是由多元调料融合而成，而非单一的、相同的水加水。

“五经”作为中华民族元典文本，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哲学思维的源头活水。《国语》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回应了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形而上本体问题，和是多元差分异质要素之间（他与他）平等、平衡的融

^① 参见张立文著：《和合哲学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2—379页。

突和合。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各派在继承、阐释、发扬“五经”文化中，开出多维的和、和谐、和合理念。道家老庄开出万物生成根据的形而上路向；儒家孔孟开出人格理想实践的人间世路向；管子和墨子开出道德修养和合的伦理论路向；《易传》开出保合太和世界的生生论路向；荀子开出展现人文精神的情感论路向。这五大路向，是当时百家争鸣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多元价值导向的凸显。然而，天下大势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一致同归于和、和谐、和合，这是当时人们最大、最高的祈求和首要价值目标。也为当代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设提供了价值依据和思想资源。

统观经学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切、古代的关照与现今的关爱，凸显了经学不是陈放在博物馆里供人参观的古董，也不是摆放在庙堂里无生命的木主，而是活生生的、生气勃勃的生命体。以经学为有生命、有智慧来观照思议经学，而应该重建、创新新经学。经学生命的重新焕发，就在于创新；经学的现代价值，也在于创新；经学的现代诠释，亦在于创新。创新才能使经学重新获得生命，而开出灿烂鲜艳花朵。我们期待经学鲜花的满园盛开！

蔡方鹿教授的《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是这个经学鲜花中满园盛开的、厚重的、坚实的一朵。他会通了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而具有开创性；揭示了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内在逻辑演化的实质，是经学的理学化，理学的经学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突和合；他探赜了经学与理学在宋、元、明各个时期经学与理学融突和合的不同特征和表现；他运用了经典诠释与哲学诠释、整体分析与个案研究、历史阐释与时代思议相融突和合方法，从而新见迭出，钩深致远，为弘扬中华文化，振兴民族精神，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龟勉成此，是为序。

张立文

2011年1月20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

前言

中国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及儒学发展到宋明时期兴起的学术文化思潮，与中国经学的发展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均为中国哲学与文化、中国儒学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经学发展到宋代，形成宋学；理学在宋学的基础上产生，具有经学的形式，亦是中国经学发展到宋代的产物，但理学又与传统经学及宋学有所不同，它是经学的哲学化、宋学的哲理化，同时也是中国经学发展的特殊形态和重要阶段，而有别于缺乏哲学思辨的传统经学及非理学的其他宋学流派。经学哲学化，是理学形成的特征，亦是中国经学发展到宋代的必然趋势。本书所从事的研究即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旨在探讨经学、宋学、理学及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把中国经学在宋元明时期的发展与宋明理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以研究经学和理学及其相互关系为基本内容，拓展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领域，加深对中国儒学发展史的认识和把握；系统、深入研究宋元明时期经学与理学的结合，经学的理学化及对传统学术的创新；并探讨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对当代新文化建设的意义。

一、经学、宋学、理学及其相互关系

如上所述，中国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及儒学发展到宋明时期兴起的学术文化思潮，理学在宋学的基础上产生，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亦有一定的区分。探讨其相互关系，对于客

观把握中国经学及儒学发展演变的趋势，拓展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经学

所谓经学，指训解、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之学。经指《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儒家经典，故系统地研究、探讨儒家群经之学即称为经学。它包括研究和探讨儒家经典产生、流传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对经传文字、名物度数的训诂，对经传义理的阐释发挥，对经书的考证等，都在经学的范围之内。而对经学流派和各派理论演变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对经学与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等，都是与经学相关的经学研究的范畴和内容。中国古代图书的四部分类：经、史、子、集，其中经部的书籍即是经学及经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中国经学是以经孔子整理的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孔子与“六经”有密切关系。孔子作为中国古代卓越的思想家和文献整理家，在创立、传播他的思想及教学实践中，以他的思想为依据，对搜集来的大量古代文献作了整理修订，编订“六经”，以“六经”为教^①。这些经孔子整理的“六经”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而对这些经典的研究，便形成了经学。故孔子是中国经学之所以产生的关键人物，世无孔子，则无经学。孔子对六经的整理编订，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中华文明的承前启后和中国文化的创造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孔子整理的“六经”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对经典的研究，形成经学。经典与经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经学史上，儒家经典历经流传、演变，由六经到五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到十三经，亦形成了五经系统和四书系统等不同的系统。在这个过程中，经学史上也形成了不同的经学派别，经学派别的划分与经典的流传演变及经典系统有密切关系。故探讨经典的流传演变与经学派别的形成发展亦是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① 关于孔子整理“六经”，参见司马迁：《孔子世家》，《史记》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5—1944页。

（二）宋学

所谓宋学，相对于汉学而言，指宋代义理之学（后延续到元明，亦包括清代宋学）。它是中国经学发展到宋代产生的以讲义理为主的经学派别，大体以理学诸派为主体，并包括了王安石新学、三苏蜀学以及当时讲义理的诸治儒家经学的流派。在宋学内部，虽有理学和非理学等各派的分野，但宋学之于汉学，从最本质的特征上讲，是以重义理、轻训诂的义理之学与重章句训诂、烦琐释经的汉唐训诂注疏之学相区别。虽然在汉学中，也有重视义理，注意阐发经典中的微言大义的；而在宋学中，也有重训诂考辨的，但大致可以说，重义理，或是重训诂，是宋学区别于汉学的显著特征。这体现了宋学与汉学各自的侧重点。可见宋学中既包括了宋代诸多讲义理的宋学人物和派别，亦包括在宋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理学。到后来理学则成为宋学发展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尤其南宋以后，理学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宋学的发展便主要体现为理学诸派的演变发展。

（三）理学

所谓理学，指宋元明（延续到清代）时期哲理化了的新儒学，亦称道学、性理学、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等，名称虽异，实质则同。理学是以抽象性、思辨性的哲理来论证儒家纲常伦理的学术文化思潮。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主流——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的发展阶段。理学在宋学的基础上产生，是中国经学发展到宋代形成的哲理化的新经学、新儒学。其宋代理学亦在宋代义理之学即宋学的包含之内，后体现了宋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与整个儒学相通，宋明理学具有崇尚仁义，提倡忠恕、中庸，主张仁政，重视教育，重义轻利、尊公轻私的思想特质，以及在新形势下发展起来的存理去欲的价值观特点。理学的基本内涵有二：一、它是儒学，而不是佛、道等非儒学，不应把它目为禅学等；二、它是在批佛老的基础上，又和合创新，吸取了佛、道等的精致的思辨哲学形式而发展起来的新儒学，即是哲理化了的、宇宙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相结合的新儒学，而不是以往缺乏思辨哲学色彩、缺乏本体论为依据的单纯伦理型的旧儒学。虽然宋明理学因其内部理论的差异而分为各个不同的流派，但各个流派在具有以上两层含义上，却是一

致的，因此而同属于宋明理学的范畴之内。

要之，宋明理学是在新形势下以思辨性的哲理来论证儒家伦理的学术文化思潮。理学各派不管有多少差异，但均以维护义理和“穷理尽性”为学术宗旨和思想特征。理本论一派以“性即理”，故强调“穷理”；心本论一派以“心即理”，故讲“尽心”；气本论一派亦讲“穷理尽性”、“立天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把以“理”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发扬光大，并将其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维护社会的治理和稳定，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思想理论的根据和保证。

（四）经学、宋学、理学之相互关系

1. 经学与宋学

经学与儒生所传儒学确有密切关系，经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注释和研究对象，并结合各个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见解。可以说，离开了儒学，离开了儒家经典，便无经学。而儒学在汉代以降，主要是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离开了经学，便谈不上儒学的流传和发展。简言之，经学与儒学也有区别，儒学的产生早于经学，孔子在创立儒学时，整理“六经”，后世根据这些经典，才逐步形成了经学。此外，儒学除以经学的形式出现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儒学的渗透和儒家思想的体现。所以儒学的内涵较经学更广；而经学较儒学为专，掌握经学的人须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由此，既不能把经学与儒学混为一谈，互相替代；亦不可把二者截然分开，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

经学历经流传演变，发展到宋代，产生了宋学，即宋代义理之学。宋学在经学的包含之中，是中国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派别。宋学与经学史上的汉学最大的不同，是它对义理的重视。然宋学也是对汉学的继承、发展、扬弃和改造。中国经学经历了一个产生和发展演变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经学派别。经学从学派上，可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以及与训诂、考据之学侧重点不同的义理之学；经学从时代上分，可分为汉学（汉至唐）、宋学（宋至明，亦延续到清）和新汉学（清）。宋学可以说是宋代产生的，延续到元明清时期的与训诂注疏、考据之学侧重点不同的义理

之学。经学与宋学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就宋学在经学的包含之中而言，宋学是训解、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之学，体现了经学的共性；就宋学是经学发展到宋代产生的义理之学而言，以其重义理的特点而与经学史上重训诂的汉学区别开来，而体现了宋学的个性。

2. 宋学与理学

理学虽在宋学的包含之中，是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理学是宋学的哲理化、经学的哲学化，而非理学的宋学流派相区别。虽然在理学酝酿形成之初，只是宋学的一部分，但后来经过理学在两宋时期的大发展，在学术界占据了宋学发展的主导地位，体现了宋学发展的主要趋势，而发展蔚为大宗，并被确立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在宋末成为官学。以至于后世有人把理学作为宋学的代名词。清代汉学家批宋学，主要就是针对理学而言。

重义理，通过治经来阐发经书中的义理，是宋学的一般特征，以此与重章句训诂注疏的汉唐经学相区别。但在宋学内部，存在着理学与非理学的分野。宋学中既有理学各派，又有非理学各派。就其共同性而言，均是以重义理为特色而与重训诂的汉学相区别。然而宋学中的理学派又把义理之学发展为理学，提出更具抽象性的思辨性哲理，将宋学哲理化，把经学理学化。

要之，由于经学史上的宋学包括了理学，到后来理学则成为宋学发展的主要内容和表现，以致学者把理学作为宋学的代名词。虽然理学是宋学的一部分，然而在宋学与理学之间不应画等号，宋学的内涵大于理学，在时间上宋学早于理学；而理学又以宋学为基础，是宋学的哲理化、经学的哲学化。

关学是理学的重要流派，以提倡气本论、富于哲学思辨而著称。其代表人物张载站在义理之学的立场，既重宋学义理，轻考据遗言，又把义理之学发展为理学，主张“义理有碍，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当自立说以明性，不可以遗言附会解之。”^① 强调治经应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在掌握义理的基础上，自立己说，以明性理。并指出：“学者只是于义理中求，……道理须从义理生。”^② 认为学者应求学于义理，而道理则是在义理的基础上产生，可见道理的重要性在义理之上。这是理学对义理之学的

① 张载：《张子语录中》，《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21—323页。

② 《经学理窟·学大原下》，《张载集》，第286页。

发展。

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来，创“天理”论思想体系，将义理之学发展成为理学，把宋学之义理哲理化，以思辨性的哲理来论证儒家伦理，这成为宋学中理学与其他派别相区别的依据。二程从时代发展的需要出发，在庆历以来义理之学的基础上，把义理之学发展为理学，以更具抽象性的宇宙本体之理与关乎人生日用的儒家伦理的紧密结合，将经学理学化。这表现在，二程以“天理”论道，着眼于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社会的治理等重大问题，他们创造性地构建“天理”论哲学体系，在经学理论上提出“由经穷理”^①和“圣人作经，本欲明道”^②的思想，以穷理作为治经的目的，其“理”即为“天理”，亦即“道”，把儒学经典作为载道之文，“经所以载道”^③，置经典于服从“道”即“天理”的位置，打破汉学对经典及注疏盲目崇拜的旧传统，从理论上解决了在经学传授过程中，儒家经典与道统之道的关系问题，从而把经学理学化，亦即道学化。既以义理之学取代注疏之学，又把义理哲理化，将其提升为“天理”，克服了旧儒学缺乏哲学思辨的弱点。这即是对庆历以来疑经思潮及义理之学的发展。

二程的理学经四传而至朱熹，对朱熹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既是宋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经学与其理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朱熹治经，以阐发义理为主要目标，但其义理的内涵，已不仅仅限于经义名理，它还包括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儒学——理学的天理、天道、心性、太极等重要理论。朱熹在治儒家经典时阐发的这些理学思想，是其经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在宋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宋学加以继承创新，发扬光大。这体现了理学与宋学的联系与区别，既不可分之太过，也不可把二者视为一物，而忽视其差别。

3. 理学与经学

宋明理学与中国经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理学家通过以己意解经，“由经穷理”，我注“四书”、“五经”；或以经书为吾心的注脚，来阐释自己的

①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8页。

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13页。

③ 《河南程氏遗书》卷六，《二程集》，第95页。